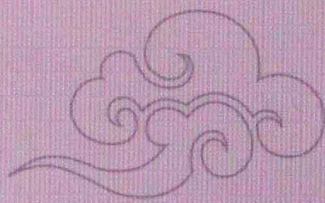


城市语言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王玲◎著



中国文学与东亚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专刊
汉语言文字学前沿丛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汉
—
语
—
言
—
文
—
字
—
学

城市语言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王玲◎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南京大学九八五三期项目经费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专项资金

经费资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语言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 王玲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 - 7 - 5161 - 1474 - 2

I. ①城… II. ①王… III. ①社会语言学—研究—中国
IV. ①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1928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项目统筹 陈 彪
责任编辑 高健龙
责任校对 李 莉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25
插 页 2
字 数 295 千字
定 价 4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语言（含文字）是人类文明的显性标志，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文化载体，其本身也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汉民族是在早期人类群体基础上产生、发展而终至形成的人类民族之一。汉语及其方言作为汉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其产生形成的过程自然也相当悠远。历史上夏、商、周三代先后相承，文化相因，一定存在某种相关的语言形式。至迟到春秋时代，汉民族共同语的早期形式——雅言就有了明确的记载。《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雅言即正言，正言自然是相对方言来说的。这说明，孔子是讲共同语的。孔子周游诸夏列国，并无语言障碍，说明这种雅言是通行范围很广的具有权威性的共同语。汉民族长期以黄河中下游的丰镐汴洛地区为政治、文化中心，华夏核心即成长于此，雅言也当以中原某一方言为基础扩展而成，至迟在春秋时代，雅言已延伸到燕、齐、秦、楚、越诸地区。秦汉之后，境内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不断交融，其结果无论是语言上还是政治、文化上，汉文化都取得了优势。在这一过程中，汉语（共同语和方言）不断扩张，以其人口和文化的优势北上南下。因时代与区域的不同，汉语保持着众多的方言，大致维护着雅言延续下的共同语形式，并对各方言施加影响。

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是汉民族形成的重要标志，是汉民族统一文化的重要内含。与汉语相适应的汉字，从甲骨文产生以来，就一直是记录汉语的书面符号，是汉语书面语表达的主要手段。汉民族悠久而灿烂的民族文化就是用汉语汉字记录、保存并留之后代、传之远方的，世界上没有几个民族像我们这样拥有如此丰厚的历史文献。

汉语言文字学，就是以汉民族的语言文字为研究本体，古称小学，是

中国学术体系的根基性学科。自汉代产生的文字学、训诂学、方言学及稍后产生的音韵学，构成了我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学科框架。汉代以降，汉语言文字研究无不在汉代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发扬光大，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积累了大量的学术经典，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章太炎曾说：“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岂专引笔画篆、缴绕文字而已。苟失其原，巧伪斯甚。”（《国故论衡·小学概说》）

我国历史上，汉语言文字学虽不乏熠熠生辉的名作巨制，但并没有形成真正具有学理性、系统性的语言学学科，在传统学术体系里一直作为经学的附庸而存在。戴震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戴东原先生集·古经解诂序》）解读经典文献是传统汉语言文字学的主要任务。

从17世纪开始，西方列强海外扩张和殖民运动风起云涌。19世纪中叶，英帝国主义轰开了中国的门户，1840年爆发了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鸦片战争。中国从此成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国力衰落，逐渐丧失了文化的自信和政治的独立。1895年甲午海战失败，中国陷入了亡国灭种的险境。在这近百年的历程中，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破碎，被迫面对西方文化冲击，进而发生历史转型。学习西方——“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就是这一历史积累下的能量的总爆发。“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社会全面转型的历史性的标志事件，从此，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全面向现代社会转型。在西学的刺激和碰撞过程中，中国的民族精英开始了全面的对中国文化和学术道统的反思，在反思中，中国学术完成了现代性转型。

在那个风雨如磐的时代，承续乾嘉学脉的章黄学人最早体认到了汉语言文字学转型的重要性。章太炎1906年发表《论语言文字之学》，他指出：“今日言小学者，皆似以此为经学之附属品。实则小学之用，非专以通经而已。”（见《章太炎讲国学》，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章太炎头一次明确提出了语言文字学的学科“非专以通经而已”。汉语言文字学挣脱经学的藩篱，独立为一个学科，是汉语言文字学向现代学术转型的重大变化。现在，我们无论称呼“汉语言学”还是“汉语言文字学”，都已远非传统“小学”所能概括的了。两者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手段上都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汉语言文字学的学术转型，是在全面接受西方语言学思想、模仿西方研究范式的历史洪流中完成的。这一转型的标志是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问世。何九盈曾经说：“跟西方现代语言学相比，我们的现代化一开始就带有补课的性质。泰西的‘葛郎玛’，历史比较法，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人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马建忠之后，汉语言文字学的许多方面都蓬勃发展起来，虽然不乏机械模仿甚至抄袭之作，但是，研究范式已经与传统小学大相径庭。此后，胡以鲁（1913）的《国语学草创》、钱玄同（1918）的《文字学音篇》、高本汉（1915—1926）的《中国音韵学研究》、赵元任（1929）的《现代吴语研究》、唐兰（1934）的《古文字学导论》、陈望道（1932）的《修辞学发凡》等著作相继问世，这些著作标志着我国汉语言文字学向现代语言学转型成功。

近百年来，汉语言文字学在学习、模仿、融会西方语言学研究范式中匍匐前进。模仿是创新的母体。在西方语言学影响下，汉语本体研究的诸多方面都突飞猛进，尤其是在民族性、地域性较强的音韵学、古文字学、方言学、历史词汇研究、古文献训释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这就像我们的很多国术一样，比如中医，举世无双，研究水平也很高，但这些成就不能说明我国的医学就具有了世界最先进的水平。同样，一个专门研究莎翁剧作或专门研究海明威小说的西方学者，如果他没有从中总结出具有认识论价值的文学理论，我们也不能说他的研究成果就具有世界影响。

毫无疑问，直到今天，我们仍然缺乏创新性的理论提炼。我们在汉语言文字研究的诸多领域，仍然是跟在西方学者创造的理论背景下开展工作。只要不带偏见的学者，都会体认到这一现实。因此，如何在汉语的本体研究中，提炼出富有认识论和方法论价值的认识体系，将是汉语言文字学任重道远的任务。

我们勾勒汉语言文字学的学科发展过程，目的是要说明，汉语言文字学要不断开拓创新，才能获得学术价值和学术生命。这个学科不仅要为解读传统经典文献服务，更要解释汉语自身的历史演变和自身构造，还要担负起总结、抽绎人类语言发展和结构规律的任务。在信息化的时代，还要参与到科技范畴的创新。

我们期盼在不久的将来，汉语言文字学能够秉承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

鸣的富有原创精神的学术传统，在吸收、融合世界优秀语言学成果的基础上，能够产生一批具有原创性的、扎根汉语事实的、带有民族气派的、富有认识论和方法论价值的论著，真正成为世界语言学的前驱。

二

我们南京大学的汉语言文字学学科，源远流长，百年弦歌，不绝如缕，名师荟萃，英才辈出。从三江师范学堂（1902—1906）到两江师范学堂（1906—1912），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4—1921）到国立东南大学（1921—1927），从中央大学（1928—1949）到南京大学（1949—），我们可以列举出一批被称为大师或名师的名字：王澐（1871—1944）、赵少咸（1884—1966）、黄侃（1886—1935）、汪辟疆（1887—1966）、胡小石（1888—1962）、汪东（1890—1963）、马宗霍（1897—1976）、方光焘（1898—1964）、黄淬伯（1899—1970）、张世禄（1902—1992）、洪诚（1910—1980）、鲍明炜（1919—2007），等等；我们也可以列举出一批誉满语坛的毕业生：吕叔湘（1904—1998）、潘重规（1907—2003）、殷孟伦（1908—1988）、高明（1909—1992）、殷焕先（1913—1994）、周法高（1915—1994）、李孝定（1918—1997）、张志公（1918—1997），等等。

一百多年来，南京大学汉语语言文字学学科凝练出了自己的学术道统，体现了扎根传统、求真务实、兼包并蓄、勇于创新的学术风格。从一开始，本学科就秉承了汉学的朴学精神，朴学曾是两江师范学堂至中央大学时期的学术招牌，特立独行的黄侃先生最具代表性。他视学术如生命，勤勉一生，为学一丝不苟，这在学界是人所共识的。南京大学早年积淀下来的朴学精神已凝化为本学科的底蕴。崇尚朴学并不意味着本学科一味抱守传统，而是主张兼容并蓄、勇于创新的。吕叔湘、张世禄、周法高、李孝定、殷焕先等都是现代语言学的开拓者。东南大学时期的陆志韦（1894—1970）本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但他后来勇于学习并修正高本汉的音韵学，竟成了现代音韵学的开拓者。长期在南京大学执教的方光焘先生留学日、法，深受西方语言学的影响，他积极参与文法革新和言语与语言的讨论，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黄淬伯更是师承清华国学院的学风，他的音韵学研究走的是现代与历史相结合的道路。鲍明炜开拓了现代江苏方言研究的一片天地。新中国成立后的毕业生

中有一大批人走向了现代语言学的征途，恕不一一列举。

在百余年的学科发展中，本学科一直弘扬的人文教育精神，强调学术训练与才情养成并行不悖，强调完美人格情操养成的重要性。前辈胡小石、黄侃等都擅文艺，学生潘重规、殷孟伦、周法高、殷焕先都是旧体诗高手，蒋维崧（1915～2006）则是书法篆刻名家。

目前，本学科在传统学术的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古文字学、文献训释等领域后继有人，奋力进取；在现代学术的语法学、方言学、汉藏比较语言学、语言规划、社会语言学等领域不落人后并有特色。

近年来，学术功利化、物质化搅扰着学术的灵魂，致使我们学科的发展面临一些困难。但是，这些困难必将是我们图强的动力。《诗》云：“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这本是自然规律，但一个学科的发展也不外于此。本校故学监清道人李瑞清先生激励两江师生的校训是“嚼得菜根，做得大事”。我们已经走过了咀嚼菜根的苦难时代，但是，如何做得了大事，却在烤炙着本学科每一位学人的灵魂。

我们有百年学术精神的激励，也有不甘人后的勇气。只要坚持朴学与新学并存、传统与创新共荣、汉学学脉与西学学统相容的学术精神，我们相信，南京大学的汉语言文字学学科一定还能继续辉煌下去。诗仙有言：“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就是我们的信心！

我们尝试着探索，尝试着创新，这套“汉语言文字学前沿丛书”就是我们努力的成果。这套丛书包含了现代城市语言使用状况的调查与对策、汉藏语言的描写与比较研究、汉语历史音韵的探索、古文字形体的演变考察、汉语语法语义的讨论、文献语言的考索等方面的研究，大致反映了我们近年来的研究取向——努力走在学科的发展前沿。本丛书的作者既有我们学科的同仁，也有与我们学科有学缘关系的前辈学者和青年才俊。这些成果不见得都像丛书的名称一样带有“前沿”性，但至少都是各位用心血凝聚的一家之言。

我们通过这套丛书，向学界请益，期盼着前辈时彦给以批评、给以鼓励！

是为序。

张玉来

2013年5月31日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第一节 城市语言研究的背景	(1)
第二节 城市语言研究的现状	(7)
第三节 城市语言研究的意义	(16)
第四节 本书内容和基本框架	(19)
第二章 城市语言研究的理论	(22)
第一节 言语社区理论	(22)
第二节 语言变异理论	(25)
第三节 语体理论	(28)
第三章 城市语言研究的方法	(34)
第一节 语料搜集和抽样的方法	(34)
第二节 多元回归分析法	(39)
第三节 城市语言研究方法的特点	(42)
第四章 言语社区调查	(44)
第一节 合肥科学岛社区	(44)
第二节 南京社区	(53)
第三节 北京社区	(57)
第五章 言语社区要素的研究	(62)
第一节 五要素的提出	(62)
第二节 五要素的实证调查	(64)
第三节 五要素的关系和作用	(73)
第六章 言语社区的实体性研究	(76)
第一节 语言变体选用和语言态度的调查分析	(77)
第二节 语言变异评价和制约的调查分析	(82)

2 城市语言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第三节 社区一致性的形成机制	(92)
第七章 言语社区与语言变异研究	(98)
第一节 进行中的变化	(98)
第二节 语言变异与变化调查分析	(101)
第三节 特点和动因	(140)
第八章 语言认同与语言使用的关系	(151)
第一节 “认同”概念的界定	(151)
第二节 语言认同与语言使用的调查分析	(153)
第三节 语言认同与新词语使用的调查分析	(170)
第四节 认同的机制	(194)
第九章 城市弱势群体的语言状况	(198)
第一节 社区生活中的弱势群体	(198)
第二节 语言生活中弱势群体的产生背景	(202)
第三节 弱势群体社区的实证研究	(211)
第十章 城市语言适应行为的实证研究	(220)
第一节 “语言适应”概念	(220)
第二节 居民语言适应状况的调查分析	(221)
第三节 语言适应行为的特点	(231)
结语	(233)
附录一 转写材料	(240)
附录二 Goldvarb 软件的统计结果	(244)
附录三 “有 + VP”句式使用情况问卷调查表	(248)
附录四 科学岛语言使用情况问卷调查表	(250)
附录五 科学岛语音变异调查朗读材料	(252)
附录六 关于儿化使用情况的调查问卷	(253)
附录七 北京儿化朗读录音材料	(255)
参考文献	(256)
后记	(266)

第一章 导言

本书介绍的研究成果属于城市语言研究的范围。城市语言研究是 21 世纪初期由中国学者发展出来的社会语言学的新方向，主要采用社会调查方法，集中研究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语言使用、语言沟通等问题。大规模、高速度的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产物，也是当今世界的重要发展趋势。城市化带来了人口流动、民族杂居、跨文化交际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对传统的语言研究提出了挑战。本书是以合肥科学岛、南京和北京等地的调查数据为依据，将城市语言的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研究而成的结晶。本书可以成为语言学理论发展的基础，也可以成为解决城市化过程中公众交际、社会整合等问题的重要事实依据，为建立和谐社会做出贡献。为对本书有个概括性的了解，这里对本书研究的背景和意义，已有研究的成果和不足，以及全书的基本框架做个简要的介绍。

第一节 城市语言研究的背景

一 研究背景

“城市语言研究”（又称为“城市语言调查”）的产生有其必然性。城市化是当今中国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规划术语》的定义，城市化指的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断地发展完善的过程。城市化必然带来语言及其社会环境的重大改变。在已有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不能适应城市化带来的新语言状况的条件下，“城市语言研究”适时地产生和发展起来了。

在社会学的研究中，考察城市化程度的主要参照指标是城市人口占总

2 城市语言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人口比例的变量。依照上面的变量,国外的研究中通常把城市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被称为城市化发展的初始期,在这个阶段,城市化率一般在25%以下,基本特征表现为城市化发展速度缓慢;第二个阶段是城市化发展的加速期,这个阶段的城市化率较之初始期有大幅提高,一般在25%—75%之间;第三个阶段是城市化发展的成熟期,城市化发展的速度相对稳定,城市化率一般都在75%以上^①。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的工业化国家或发达国家基本实现了城市化。例如,我们熟悉的瑞典、英国、联邦德国和澳大利亚等国早在1965年的时候,已经进行了城市化发展的成熟期,当时四国的城市化率分别为77%、87%、86%和83%^②。

和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要相对曲折和缓慢。现在的研究一般把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被称为城市化发展的起步期,指的是1949年至1960年这一阶段,当时的城市化率从建国之初的10.7%上升到1960年的19.8%;第二个阶段是中国城市化的停滞期,时间跨度从1960年代持续到1970年代,城市化率不升反降;第三个阶段是城市化的重新发展期,时间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城市化率由第二阶段的17.4%上升到26.2%;第四阶段出现在90年代以来,是城市化发展的提速期,城市化发展的比率逐渐增加。1989年的城市化率只有26.2%,到了2001年已经上升到38%,两年之后又增加至40.53%^③。目前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在2011年间,中国的城市化率首次超过50%^④。按照上面的指标,当今中国正在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城市化发展时期。有些学者把当前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态势形象地总结为“中国正处于一条城市化的高速公路上”^⑤。城市化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改变,也推动着社会结构的分化,拓宽了中国的社会流动渠道、加速了中国的社会流动。在社会结构方面,中国社会已分化成十

① 郑孟煊:《城市化中的石牌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② 李强:《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8页。

③ 郑孟煊:《城市化中的石牌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④ 2012年5月23日,中国新闻网, (http://www.qianhuaweb.com/content/2012-05/23/content_2986489.htm.)

⑤ 同上。

大社会阶层^①，一个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在中国形成；在社会流动模式方面，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一个现代社会流动机制的模式。按照社会学的解释，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从某一种社会地位转移到另一种社会地位的现象。改革开放前，决定中国居民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以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为主。这个主要的决定因素使很多人丧失了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机会，这一时期，整个中国的社会流动缓慢，流动率低。改革开放后，改变社会地位的决定因素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靠个人努力和业绩等因素的后致性规则开始发挥重要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居民靠自身的努力改变了社会地位，整个社会的活力大大增加，社会流动量加大，社会流动率不断提高。以改革开放前后来看，代际流动率方面，1980 年以前代际总流动率只有 41.4%，不流动率是 58.6%，也就是说，父亲是什么职业，近六成的子女也还是这个职业地位，只有三成多的子女能实现向上社会流动。1980 年以后，代际总流动率达到 54%，上升流动率上升到 40.9%，即，和父辈相比，有四成的子女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②。

语言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又具有与社会共变的可变性特点。伴随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也必然会引起语言使用功能的变化及语言关系的变化。而且，由于城市化的进程是逐步进行的，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口不断地涌入城市，其结果必然加大城市各方言区人们杂居的分布局面。这种城市人口分布的重组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的变化，也会影响城市语言使用、语言认同等方面的变化。因为，“语言本身不会变，只有通过人的使用，语言才可能变。语言本身对其命运是无能为力的，是人维护或改变着语言”^③“研究语言完全无视社会环境，就不可避免地会忽视语言较复杂、较有趣的某些方面，失去理论进一步发展的机会”^④。

① 十大社会阶层：1.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2. 经理人员阶层；3. 私营企业主阶层；4.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5. 办事人员阶层；6. 个体工商户阶层；7. 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8. 产业工人阶层；9. 农业劳动者阶层；10. 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版，第 14 页。

②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

③ 李巍：《社会语言学中的“网络分析”》，《国外语言学》1995 年第 2 期，第 48 页。

④ Trudgill, Peter. , *Introduction Language and Society*. London: Penguin English. , 1992, p. 22.

从上面的叙述可见,20世纪60年代社会语言学在欧美蓬勃兴起后,欧美各国当时已进入后现代化社会,城市化时期的语言演变已基本结束,而此时社会语言学刚刚兴起,因此欧美的社会语言学家未能及时地观察到城市化加速期的语言演变情况,也无从了解其现有的言语社区结构的形成过程,处于城市化加速期的中国面对各种现实问题却没有先人的研究成果作为参考依据。一批中国的社会语言学家适时地将研究目光投向了城市化进程中的语言,运用社会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进行系统的调查和分析,由此产生了“城市语言研究”的新方向。这样的研究不仅能解决我国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各种语言问题,而且能解决整个人类社会城市化过程产生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言语社区形成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

二 发展历史

社会语言学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当时美国已经是个高度城市化的社会。因此,城市环境中的语言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但是,由于缺乏对比,早期的社会语言学家并没有对其研究对象的“城市”性质引起重视。由于其在研究方法上与传统方言学产生差异,因而被称为“城市方言学”,也没有更多的针对“城市语言”的理论探索。但是处于城市化大变革之中的中国社会语言学家对城市化本身的动态效应产生了兴趣。

在上述背景之下,“城市语言研究”在21世纪的中国诞生了。2003年6月在南京大学召开的“首届城市语言调查专题报告会”可以作为这一新的研究方向起始的标记。早在20世纪70年代,荷兰学者范德博(Marinus van den Berg)在台湾的几个城市就进行了语言使用情况和语言态度的调查,发现了城市化带来的语言状况特征。作为城市语言调查的先驱者,他的研究成果和使用的调查方法至今成为城市语言调查的一个典范。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徐大明回国调查了新兴工业城市包头的语言状况,发现了与西方城市社区迥然相异的言语社区结构。20世纪90年代,中国语言学者杨晋毅在一系列新兴工业区展开了语言状况的调查。这些研究都是比较典型的城市语言调查的研究,也为随后的城市语言研究奠定了基础。国内外,类似的早期研究还有一些,但都没有统一到“城市语言研究”旗号下,也没有系统的理论建设,影响较小。2002年徐大明

加盟南京大学以后,开设了《城市语言调查》选修课,并邀请范德博、杨晋毅等学者来校演讲,筹划申报城市语言调查方面的研究项目。随后,在培养了第一批“城市语言研究”的学生的基础上,南京大学中文系于2003年6月成立了社会语言学实验室。实验室成立的同时召开了“首届城市语言调查专题报告会”。

2004年南京大学社会语言学实验室一周年庆典时举办了“第二届城市语言调查专题报告会”。参加这两次报告会的人员中,除了南京大学的学者以外,还有来自国内各地和境外的一些学者,报告内容包括了南京、洛阳、郑州、西安、武汉、香港、澳门等地语言调查的成果。这两届城市语言调查专题报告会虽然规模还不是很大,但却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体现了一个有组织、有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方向的开始。城市语言调查的研究方向很快引起了国内外语言学界的关注;2004年以来,国内外有关城市语言调查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从2005年开始,“城市语言调查专题报告会”更名为“城市语言调查学术研讨会”,在国内外公开征稿,办成了一个国际性的语言学会议。2005年6月第三届城市语言调查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注册参加会议的代表42人;国内代表来自不同省市的十几个单位;国外的代表超过三分之一,来自8个不同的国家。会上不仅报告了多项调查成果,也集中讨论了城市语言调查的理论和方法、城市环境的言语交际问题和语言认同问题、城市化所带来的语言变异和变化等几个议题。会后,《中国社会语言学》等杂志发表了会议上提交的大部分论文。第三届城市语言调查学术研讨会是城市语言研究的国际化发展的转折点。第四届城市语言调查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7月在德国曼海姆(Mannheim)举行,会议的主题是“城市语言调查方法论”,会上报告了多个国家的语言调查成果,并讨论了不同的调查方法,包括问卷调查方法、非介入式测量、参与观察、变语配对实验等。

第五届城市语言调查研讨会于2007年7月在荷兰莱顿(Leiden)举行,会议主题是“工业化、城市化、语言接触与中国和欧洲的语言认同的形成”。作为该会议的附属活动,“城市语言调查讲习班”也在莱顿开办,来自中国、荷兰、德国和美国的10余位研究生参加了该讲习班。第六届城市语言调查研讨会于2008年7月在中国上海举行,会议主题是“城市化中的语言接触与语言认同”,来自荷兰莱顿大学、乌特勒支大学、

中国香港城市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海内外十多所高校三十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

2008年7月15日至17日,南京大学语言战略研究中心召开了“城市语言调查国际研究网络”研讨会,来自国内外不同院校的十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经过三天时间的深入讨论和反复协商,会议决定成立“城市语言研究国际联络网”,由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徐大明教授担任联络网的总协调人,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将作为该国际联络网的联络中心。“城市语言研究国际联络网”确定了五个主要研究方向,由南京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和乌特勒支大学的五位教授分别负责牵头联络。“城市语言研究国际联络网”近年来开展的活动包括:“语言、城市化与民族认同”研讨会、“语言普查与语言规划”工作坊和“城市语言研究”网站建设等。

第七届城市语言调查研讨会于2009年6月在香港举行,来自中外各高校共二十五名学者参会。此次会议主要议题是“基于语言接触的语言演变及身份认同转换——中国及欧洲的城市化进程”。会议由中国香港城市大学主办,邹嘉彦教授致开幕词并讲述城市语言研讨会的发展历程及开展城市语言研究的重要性;教育部语信司李宇明司长做主题发言,深刻探讨语言资源问题。

2009年召开的第16届国际民族学与人类学大会设立了一个以“语言、城市化与民族认同”的分会场,来自二十几个国家的数十位学者提交了论文。2010年6月第八届城市语言研究学术研讨会在长春举行。本次研讨会由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荷兰乌德勒支大学语言研究学院共同主办,会议主题为“中欧工业化、语言接触与认同的形成”。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信司司长李宇明教授、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顾问德斯万(Abram de Swaan)教授和日本县立广岛大学的友定贤治教授应邀在会上分别作了题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语言问题”、“Chinese in the World Language System”和“广岛年轻人用语——今日はいい天気ゾヤ”的主旨演讲。在该届研讨会上,来自国内外的30位学者的论文经评审被列入会议议程,涉及城市语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等多方面的内容。来自境外五个国家和地区的10位学者和40余位国内学者出席了会议。

第九届城市语言研究学术研讨会于2011年11月在中国厦门举行。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言司司长李宇明教授,荷兰乌特勒支大学语言学研究院的汉斯(Hans Van de Velde)教授和日本大学的田中由加里教授在会上分别作了题为“科学管理语言生活”、“方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共生(The Symbiosis of Dialectology and Sociolinguistics)”和“定义‘角色方言’?(“Dialect Cosplay” Defined?)”的主旨演讲。来自七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在研讨会上发表了50余篇论文,内容涉及“城市化背景下的语言接触”、“城市化背景下的语言更替”、“城市方言的现状与未来”、“进城农民工的语言生活”、“少数民族语言规划”和“中日年轻人用语”等多个议题。第十届、十一届和十二届城市语言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在荷兰、日本和中国举行。

城市语言研究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是,2006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将城市语言调查列入“十一五”科研规划中的语言学重点研究方向。同样是在2006年,荷兰国家科学基金会也开始资助由荷兰、德国和中国学者的合作的“工业化、语言接触,与认同的形成”项目。2009年,荷兰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第二期资助开始。2011年日本学术振兴会也开始资助有关研究。此外,2005年和2006年出版的《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城市语言研究专辑和剑桥学者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中国和欧洲的城市化与言语社区重组》也是城市语言研究成果的一些重要标志。

第二节 城市语言研究的现状

国内较早开始研究城市化与语言的学者是河南洛阳科技大学的杨晋毅先生,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比如,对中国新兴工业区语言状态研究、对城市语言使用状况的调查等。2002年始,南京大学社会语言学实验室在南京社区展开一系列城市语言方面的调查。中国的其他学者也开始了不少城市语言调查方面的研究。由于城市语言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中国学者的研究内容也丰富多样。下面介绍的是城市语言研究主要的研究课题。分析的依据是近年来发表在《语言教学与研究》、《语言文字应用》以及《中国社会语言学》等期刊的近百篇论文。